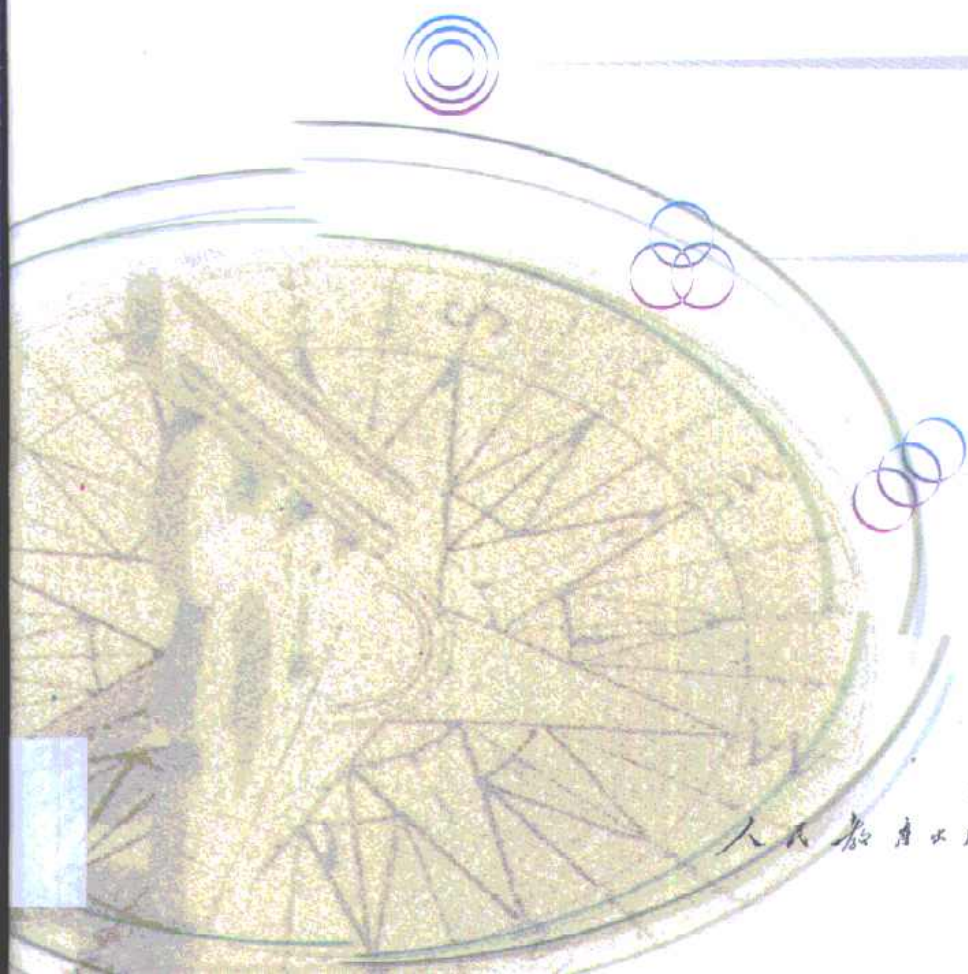


吕达 著

全国高师教育专业教材

课程史论

KECHENG SHILUN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全国高师教育专业教材

课程史论

吕 达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我国近代普通中学课程发展为线索,通过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和不同国别的横向对照,反映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缩影,从而阐明了学校课程变革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进而以史为鉴,对我国当代课程改革提出了探索性构想。

全国高师教育专业教材

课程史论

吕 达 著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沙滩后街 55 号 邮编: 100009)

网址: <http://www.pep.com.cn>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5 字数: 390 000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150

ISBN 7-107-13042-0 定价: 25.00 元
G·6151(课)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市方庄小区芳城园三区 13 号楼 邮编: 100078)

引 言

(一)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一个重要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的培养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教育的核心是学校课程,因为课程集中、具体地体现了教育目标,是人才培养的蓝图。课程的编制和实施,是实现教育目标的手段。课程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中介,教师和学生都是围绕课程进行教学活动的。

课程问题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现在,国际上教育科学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三C:课程研究(Curriculum studies)、课堂研究(Classrooms studies)和比较教育(Comparative education)。教育改革不外是对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手段的改革。所谓教育内容的改革,就是课程改革。没有哪一次成功的教育改革离得了成功的课程改革;课程改革往往是教育改革的突破口。美国学者罗伯特·特拉弗斯(R. Travers)正确地指出:“教育研究的中心点无疑应在课程领域内。”⁽¹⁾

“课程”是一个含义极为广泛的概念,它用得极为普遍,而定义却人言人殊。最广义的课程概念照杜威的理解是指儿童(受教育者)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全部经验。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课程,是指学习者在学校的指导下所获得的全部经验。也就是说,课程是指为实现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而规定的教育内容及其

目的、范围和进程的总和。^[2]简而言之,课程的基本含义是指学校课业内容及其进程。“课”,是指课业,即教育内容,“程”,是指程度、程序、进程。狭义的课程概念,也可以是指一门学科及其进程。通过对学校课程的剖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学校在教什么内容;为什么教这些内容;又是怎样教这些内容的。通过对学校课程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一个剖面看到:当时科学文化的水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以及青少年儿童成长的情况。因此说,“所谓学制问题,不过是反映了社会分工的纵断面;所谓课程问题,不过是反映了社会分工的横剖面。”^[3]

(二)

在课程问题中,普通中学的课程问题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从学校系统和培养目标看,小学是实施基础教育的低级阶段,大学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职责,而普通中学,就升学而言,它是介于小学和大学之间的枢纽和连锁,它既是前者的延续,又是后者的准备;对于不升学的学生来说,它又要为他们的就业提供一定的准备,因而它又是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的桥梁。总之,普通中学既不是单纯的升学预备教育,又不是单纯的职业预备教育;它是培养合格公民的基础教育的重要阶段。此其一。其二,从学生的身心特点看,中学阶段正是人的一生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的重要时期。人的一生的身心发展是有阶段性和程序性的。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最迅速,最显著,变化快,可塑性大,而青少年时期恰恰是在中学阶段度过。在这个阶段,青少年学生的能力和性向差异明显扩大,对今后一生的影响至关重要。其三,从历史经验看,我国从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校以来,无论是学制,还是课程,变化最大、最多的是普通中学阶段。曾经有几个时期,唯独中学的学制和课程发生变更,而其他各级教育依然如故。例如,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中学文实分科;又

如1917年中学增设第二部,开设职业选科。其四,我国教育的症结历来也在普通中学阶段。^[4]在各级各类教育中,问题最多、最难处理的是普通中学。不仅近代教育史上情况如此,即使现在,这个问题也还不能说已经解决好了。据统计,我国小学毕业生的合格率一般在90%左右,而普通中学毕业生尤其是初中毕业生的合格率大大低于小学,不少地区初中毕业生的合格率只有30%左右。^[5]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课程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其五,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普通中学具有了新的特点,面临着新的问题,尤其是课程设置如何改革的问题。一方面,由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使初级中学不仅是普通中学的初级阶段,而且是义务教育的高级阶段,这就使初级中学带有了新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初中毕业生实行了分流,一部分学生进入中等职业教育系统,因此普通高级中学究竟应当如何办,也面临新的问题。

包括普通中学在内的中等教育的重要性,日益为国际教育界所认识。1986年12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40届国际教育大会,充分强调了中等教育的重要意义。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发言中宣布:中国政府把发展中等教育作为自己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6]由国家教育委员会组织的“普通中学课程改革研究与试验”也大规模地开始进行。这个课题由基础教育司负责,得到华夏基金会资助,已列为国家重点教育科研项目之一,包括全国各地十几个子项目。

(三)

为了把今天的普通中学教育搞好,我们有必要对我国近代普通中学教育,尤其是普通中学的课程演变过程进行回顾、总结和评估。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7]同

时又认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多种观点的胚胎萌芽。”^{〔8〕}这就是说，对近代社会的解剖，既可以理解古代社会提供钥匙，同时也可以找到现代社会多种观点的胚胎。

课程问题同样如此。历史是割不断的，现代的学校课程不可能脱离已有的历史传统。“现代许多新的课程理论与改革意见都有很深的历史根源”。^{〔9〕}“现在的根，深扎在过去，而对于寻求理解现在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子的人们来说，过去的每一事件都不是无关的。”^⑩

我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我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一方面，独立的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独立）的国家，并局部向殖民地沉沦；另一方面，封建社会逐步演进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经济上也有半殖民地殖民地的一面，但是资本主义因素毕竟进一步产生并有所发展。^{〔11〕}

在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教育也在向近代化的目标艰难地前进。^{〔12〕}封建主义教育逐渐瓦解，但它不是向资本主义教育演化，而是向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演化。一方面，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不同于真正的独立的资本主义新教育，因为它不仅依然带有封建教育的残余，而且含有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毒素，这种教育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同盟的重重束缚而畸形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我国近代教育又不同于完全旧式的封建教育，也不同于由帝国主义完全统治的殖民地教育。伴随着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也在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新教育改革的动力和基础。因此我国近代教育带有资本主义的色彩和因素，具有历史进步性的一面。^{〔13〕}

无需否认，近代中国社会是落伍了。所谓落伍，是相对于当时

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但是相对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来说,近代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还是前进了,发展了。尽管由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勾结,这种前进和发展过于缓慢、过于艰难,但毕竟还是前进、发展了。在教育领域同样如此。

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往可以知今,可以察来。近代是连结古代和现代的一座桥梁。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近代教育的意义更大。如果说,历史上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末,近代史上与现代的“相似之处”更多,更值得我们研究,引为鉴戒。

(四)

长期以来,我国对课程历史和课程理论的研究都不够重视。一方面,对我国历史上的学校课程,特别是近代普通中学的课程,还未曾有过全面而深入的研究。^[14]另一方面,课程论未曾被当作教育学的下位理论之一,因而在科学研究中未曾被置于同教学论一样重要的地位。学校的课程编订和课程改革,由于缺少课程历史研究与课程理论研究这两大块基石,因此产生的问题是,课程编订和课程改革缺乏坚实的可靠的科学依据,加之缺乏应有的评价制度,因而往往受狭隘的经验论束缚或左右,造成变动频繁,使教学工作无所适从。

近年来,我国的课程研究工作重新受到了重视。课程教材研究所的成立,《课程·教材·教法》专业性学术刊物的创办,《课程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都是突出的标志。目前,我国对课程理论的研究已经开始起步;国外一些有价值的课程理论也已被我国学者详尽地介绍进来;同时,各地学校特别是普通中学的课程改革试验正在广泛地展开。相比之下,对我国学校课程历史的研究,远远跟不上深化教育的需要。

(五)

本书试图通过对我国近代普通中学课程渊源和沿革的探讨,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封建教育如何向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演化的过程,从而加深对学校课程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同时,力图从我国近代普通中学课程演变轨迹中,寻找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并为今天的课程编订和课程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以便少走弯路或不走弯路,少犯或不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错误。

本书以我国近代学制的建立为界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述我国近代学制建立前,课程演变的概况,实际上也同时探明了我国近代普通中学课程的渊源。下篇,论述我国近代学制建立后,普通中学课程的历次重大沿革。

鸦片战争前后一直到壬寅、癸卯学制颁布前,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尤其是甲午战争前,我国还没有正式意义上的普通中学。但是我们从早期教会学校、洋务学堂、书院的变通和改章,以及资产阶级兴办的新式学堂中,可以看到近代普通中学课程已经产生萌芽,并逐渐形成雏形。如果没有这个萌芽和雏形时期,癸卯学制及其所规定的近代课程就没有实施的基础。就我国近代学校课程出现的上限而言,有的论者仅从 1862 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为开始,甚至延迟到从 1903 年癸卯学制的制订为开始,而对萌芽和雏形时期的学校课程忽略不谈,造成一大块空白,这是与史实不相符的,因而不能认为是科学的。清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官办近代学堂京师同文馆虽然主要是一所外国语专科学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的教学也包含了普通中学的课程。而在这所近代学堂之前,来华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里,也已经设置了种种近代课程,例如自然科学、外国语、外国史地、音乐、体育等,它不仅直接影响

了为数不少的教会学校学生,而且对我国当时其他学校的课程都有影响,这是不应避而不谈的,也不应把它排斥在中国近代课程史之外的。

从癸卯学制的颁行,经过清末短暂的文实分科,特别是民国初年资产阶级的教育改革,我国普通中学的近代课程体系可以说是奠定了基础并确立起来了。癸卯学制虽然基本上是移植了日本的学制,不完全符合我国国情,但它毕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从历史记载看,凡有条件的地方,学校课程都遵照了这个奏定的章程。因此,把《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看作我国近代课程体系的奠基石,是并不为过的。1909年普通中学文实分科虽然为时不长,但这一段课程演变史对我们今天仍可以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所以不应因其时间短暂而忽略。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包括课程改革)是以资产阶级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完全人格教育思想为指导的,它反映了一种重大的根本性的历史进步,同时也暴露了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弱点。1922年学制与课程改革,发生在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为背景的五四运动之后,因此充分反映了人民大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对民主和科学的渴求;但是这次学制与课程改革同时又带有深刻的美国化印记,不仅在形式上引进了美国综合中学制度,而且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极大地受到了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

还应当指出的是,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对普通中学课程进行了频繁的修订,包括1929年中学暂行课程标准、1932年中学正式课程标准、1936年修正中学课程标准、1940年修正中学课程标准、1948年修正中学课程标准。它一方面固然是国民党政府为了加强统治的需要,但是不应否认的是,其中也确有使学校课程更完备,以适应青少年身心发展需要的一面;而这后者正是我们今天可以而且应当批判继承的。因为今天的中国毕竟是昨天的中国 and 前天

的中国的发展,我们不当割断历史。^[15]

本书的结论部分,一方面从我国近代普通中学课程演变的过程中引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诸如学校课程如何做到既面向世界、又立足本国,也即如何处理国际化、现代化与本国传统和实际的关系问题;如何看待课程演变过程中的“钟摆”现象的问题;课程编订如何兼顾社会、儿童(受教育者)和知识这三大要素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初步阐发了我国近代普通中学课程的演变对我们今天的一些启示,诸如普通中学课程的完整性与劳动技术课程问题;普通中学课程的基础性与综合课程问题;普通中学课程的多样性与分科选科问题;同时,对普通中学课程改革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的若干理论问题,也作了一些刍议。结合历史经验对上述问题的论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进行今天的课程改革,使教育更好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更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格人才。

【注释】

[1]《课程·教材·教法》1981年第2辑86页。对于学校课程研究,美国重视得较早。因为从十九世纪末起,美国工业跃居世界首位,需要大批有文化、有技术的熟练工人,于是出现一股追求效率(efficiency)的思潮,一些教育学者提出要用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单凭经验来编制学校课程。其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教育管理学院的教授富兰克林·波比特(F. Bobbitt 1876—1956)。他于1918年著《The Curriculum》(《课程》,张师竹译,商务版),1924年著《How to Make a Curriculum》(《课程编制》,熊子容译,商务版),运用当时美国“工业管理学之父”泰罗(F. W. Taylor)的企业管理原理,提出了活动分析(activity analysis)理论。他认为,人类生活尽管千变万化,但总是由某些基本的活动构成;教育者应当分析这些基本活动,从而确定学校课程目标,选择和组织课程内容。与此前后,杜威1902年著有《儿童与课程》,W. 查特斯1923年著有《课程建设》。波比特等人的课程理论的创立,标志学校课程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而得以改进和完善,但其缺陷是把课程和教学作工程学的理解,导致把受教育者当作工厂总装配线上的产品,这是机械主义的错误。四十年代末,饶富·泰勒(R. W. Tyler)在《课程和教学的基本原理》(1949

年)一书中认为必须从社会、学习者和学科这三个方面来考虑课程目标,同时提出把课程评价作为一个必须的环节纳入课程编订的过程,从而对波比特的理论作了补充和完善。六十年代后,布鲁纳等人对课程理论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参阅《外国教育动态》1987年第2期。

〔2〕课程包括课程规划(教学计划)、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和课程内容(教材)。但我们有时也把课程和教材并提。在这种时候,“课程”更侧重于指课程规划(教学计划,即教学科目和活动的程序、时数和结构)和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即各学科的教学目的、要求、任务、范围和课时分配),“教材”则更侧重于指课程内容(包括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也包括讲义、音像视听教材等)。在这种时候,课程是教材的前提,教材是课程的具体化。

〔3〕《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1944年5月27日《解放日报》社论。

〔4〕1931年国联考察团:《中国教育之改进》认为:“中国国家教育之弱点即在中等学校……”,这段话应当说是反映了当时中国教育的客观状况。该书还指出:“顾全部教育系统,实以中等学校为枢纽。盖中等教育居学校教育之中心,所以为初级教育之基本学科与高等教育之专门学科间之连锁者也。”

〔5〕1981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和1987年第5期《人民教育》。

〔6〕198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据统计,1985年我国有普通中学93221所,在校学生4705.9万,其中高中生741.1万,初中生3964.8万;专任任课教师265.16万,其中高中教师49.17万,初中教师215.99万。

〔7〕《马恩选集》第2卷108页。

〔8〕《马恩全集》第20卷386页。

〔9〕D. Tanner and L. Tanne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1980, U. S. A. Chap5.

〔10〕《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5期41页。

〔11〕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线索问题,史学界现在主要有三种观点:1. 三个高潮论。以阶级斗争为标志,认为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发展的基本线索。2. 四个阶梯论。认为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标志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3. 双线论。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应该包括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和发展资本主义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笔者赞同双线论的观点。

〔12〕关于“近代化”这一概念,诸说不同。近代化和现代化在西语中是一个词(modernization)。但是按历史逻辑来说,现代化是近代化的演进。近代化这个词出现于本世纪二、三十年的中国论坛,它与西化相联系。笔者同意这样的说法:我国的近代化,大

体指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世纪初叶,中国人追求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科学和工业革命的成果而言。而现代化,大致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参阅1987年8月26日文汇报二版陈旭麓教授答记者问。又参阅1987年8月19日光明日报三版近代中国与中国近代化讨论综述;《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一文;《日本教育的现代化》第一卷(日本国际教育资料中心组撰,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

[13]这一观点,笔者在1981年完成的硕士论文中已初步提出,现在仍然坚持。拙文已分别摘登于上海师大和东北师大学报,并经删节收入《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传》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4]笔者见到解放前出版的小学课程研究专著多种,其中有《小学课程研究》(朱智贤,1933年商务版)和《小学课程概论》(程湘帆,1933年商务版);而中学课程研究专著难以见到。课程演变史方面的专著,笔者主要见到两部,也都是小学的,一部是《小学课程沿革》(盛朗西,1933年中华版),另一部是《近代中国小学课程演变史》(陈侠,1944年商务版)。还有一部《中国学校课程沿革史》(徐雄,上海太平洋书店1929年版)则是讲古代的。

[15]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兴办了大量完全新型的学校,对于这些新型革命学校的课程,拟另文专述,故本书不再加以论列。

上 篇

我国近代学制建立前课程演变的概况

——兼论我国近代普通中学课程的渊源

概 述

我国学校课程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课程的粗略设计。《礼记·内则》说:“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外就傅,食宿于外,学书计”;“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礼记·王制》说:“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孔子的私学则有所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的说法。^[1]这些都是关于教育内容和进程的历史记载。

至于“课程”这个词,^[2]据考证,在我国,至迟在唐宋时代已出现。唐代孔颖达在《五经正义》里注释《诗经·小雅》时就用过“课程”这个词。^[3]南宋朱熹在《朱子全书·论学》里,又不止一次使用“课程”一词,例如:“宽着期限,紧着课程”,“小立课程,大做功夫”,等等。这里的“课程”一词,已有课业及其进程的含义,即所谓“定式授事”之意。

古人对课程的安排,有因年龄而异者,有因季节而异者,还有因朝夕而异者。^[4]他们已懂得对教育内容初步分类并按一定顺序安排于不同年龄、不同程度的学生学习,以便取得更好的效果。

但是我国古代的课程从总体上看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课程

设置还没有完全科学的分科；二是课程内容特重人伦道德教育，占的比重过大；三是“劳心”与“劳力”相分离，脱离生产劳动；四是从安排形式上一般是单科独进，即学完一门课后再学另一门课，而不是各门课程齐头并进；五是对在学年限、年级、年龄和程度，还没有严格的规定，没有建立起在课程上相互衔接的学校制度。

我国古代只有“大学”和“小学”的名称，而没有“中学”的名称。^[5]我国的普通中学系统是从第一个近代学制——癸卯学制颁布后才正式确立的。但是我国近代的中学教育早在癸卯学制以前就有了。当时的中学教育，有的是在教会学校里进行，有的是在洋务学堂里进行，有的是在变通或改章后的书院里进行，有的是在其他新式学堂里进行。从上述学校的学生年龄特别是他们所学的课程内容程度来看，中学教育实际上包含在其中，尽管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普通中学。我国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早在 1884 年开始撰写的《大同书》里，就曾详尽地论述了他理想中的中学教育。

我国近代中国人自办的比较明确的中学，可以说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的 1895 年，名义上由洋务派官僚盛宣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的二等学堂。虽然盛宣怀在奏稿中说这所学校的二等学堂相当于“外国所谓小学堂”，^[6]但是从它的学生年龄特别是课程内容来看，实为相当于大学预科的中学。这所学校实际上是由资产阶级人士蔡绍基等人与美国人丁家立主持的。天津中西学堂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学校分级办理的开始。1896 年刑部侍郎李端棻上书《请推广学校折》，提出“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的主张，请求在京师设立大学堂的同时，在各省和府州县遍设中学堂、小学堂，这就进一步从理论上发出了我国近代三级学制的先声。这个奏折实际上是出自与李端棻有姻亲关系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梁启超的手笔（李的堂妹李惠仙妻梁）。而 1897 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该校四院并设，除师范院外，有上院、中院和外院），则是我

国近代三级学制的雏形。这所学校的中院即相当于普通中学。

在戊戌变法高潮中,资产阶级维新派进一步大力鼓吹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在中国正式建立包括普通中学在内的完整系统的学校制度。1898年,出自梁启超手笔的清政府总理衙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所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第三节指出:“西国大学堂学生,皆由中学堂学成者递升。今各省之中学堂,草创设立,犹未能遍,……当于大学堂兼寓小学堂中学堂之意”。该章程第四章第二节又规定:“各省上自省会,下及府州县,皆须一年内设立学堂,府州县谓之小学,省会谓之中学,京师谓之大学”,依次修业递升。⁽⁷⁾同年,清政府下令全国改书院为学堂,郡城书院改为中学堂。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里也曾详尽地阐述了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的教学内容和办学方法。⁽⁸⁾

封建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后,一度复旧。但1901年清政府迫于内外交困,不得不推行新政,重谕书院改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是为政府正式兴办中学堂之始。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和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则从制度上确立了我国普通中学的地位。

由上可见,我国中学教育实际上经历了从鸦片战争前后到戊戌维新运动前后这样一个漫长的滥觞时期。同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诞生,都要经过一个孕育过程一样,我国近代的中学教育在壬寅、癸卯学制颁行前,已经产生并逐渐发展。因此,我们论述我国中学课程近代化的进程,就不能不追溯到壬寅、癸卯学制以前。可以说,如果没有那半个世纪左右的滥觞时期,癸卯学制规定的课程(包括中学堂课程)是不可能确立和实施的。当然,由于癸卯学制之前,我国的普通中学还只是处于萌芽和雏形的无系统状态,因此,我们在论述普通中学课程的渊源时,就不能不同时涉及当时各种形式不同、体制各异的大学和小学。

癸卯学制建立前,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找到我国近代普通中学课程的渊源:一是来华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二是清政府设立的洋务学堂;三是在维新变法思潮影响或推动下改革的书院和兴办的学校。

【注释】

〔1〕见《论语·述而》。《徐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载有刘秉果:《“孔子以六艺教”考辨》一文,认为孔子的教学内容是“文行忠信”;所谓“孔子以六艺教”,不是指礼、乐、书、数、射、御,而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可参阅。

〔2〕“课程”一词,英文为 curriculum,由 race course(赛马的跑道)转化而来。就象运动员牵马沿着一定的跑道向目标赛跑一样,学生也须在教师指导下,按学校规定的内容进行学习,才能实现教育目标,由不成熟走向成熟。可见“课程”的一般含义是指有目的、有计划、有指导的教育内容。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英国教育家斯宾塞《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文中,他把经过组织的教育内容叫做课程;该文1859年发表,1861年收入《教育论》一书出版。

〔3〕《诗经·小雅·小弁》:“奕奕寝庙,君子作之”,疏中有“教护课程,必君子监之,乃得依法制”之句。

〔4〕因朝夕而异者,例如“朝而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修复,夜而记过”。

〔5〕《尚书·大传·周传》:“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学小学”。又,郑康成为《礼记·王制》注曰:“上庠,右学,大学也;下庠,左学,小学也,东序,东胶,亦大学;西序,虞庠,亦小学”。清末资产阶级维新派在鼓吹变法时,往往仿效孔子托古改制的手法。他们提倡废科举、兴学校,便论证说兴办学校原来就是我国古代的优良传统;然而无论如何也难以证明我国古代已有中学制度和名称的存在。例如梁启超在《变法通论·学校总论》里说:“学校之制,唯吾三代为最备,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立学之等也,……《大学》一篇,言大学堂之事也;《弟子职》一篇,言小学堂之事也;《内则》一篇,言女学堂之事也;《学记》一篇,言师范学堂之事也。”

〔6〕《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稟》,或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72页。

〔7〕《变法自强奏议汇编》卷10,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一册135页、141页。

〔8〕《劝学篇》设学第三、学制第四。